

论科幻小说元叙述及其后现代意义建构^{*}

聂 韶 敬琼尧

摘要：元叙述是后现代文学的重要书写策略，能够揭示叙述的自我意识，呈现文本虚构性与经验真实再现之间的认知张力。然而，元叙述在现代科幻小说中的特性与特征却鲜有研究与总结。本文探讨 20 世纪 60 年代科幻小说创作与批评实践在元叙述模式中的幽微互动，通过参与文体规则的符码游戏，以形成鲜明的“批评性”与“交流性”特征，并在作品中展现“露迹式”与“多叙述合一式”元叙述的具体建构。本文认为，在元叙述为读者提供未来世的文本空间并渗透作者私人意志的同时，现实经验与传统惯习中割裂与间隔的碎片、拼贴、反传统等后现代表达所面临的阻碍，通过元叙述的表达模式，也能于科幻这一逐渐流行的现代文学体裁中得以消解。

关键词：科幻小说，元叙述，批评性与交流性，露迹与多叙述合一

On Science Fiction's Meta-narr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Significance

Nie Tao Jing Qiongyao

Abstract: Meta-narrative is an important writing strategy in postmodern literature, which reveals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narrative and presents the cognitive tension between the fiction of the text and the reality of experience.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presentation of meta-narrative in modern science fiction are rarely studied. This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非裔文学史》翻译与研究”(13&ZD127)的中期成果。

□ 符号与传媒 (29)

paper explores the subtl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fiction writing and its criticism practice in the meta-narrative mode in the 1960s. It analyses how a science fiction piece presents a distinct representation of “criticism” and “communication” by considering symbolic stylistic rules. These two characteristics are integrated in the meta-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exposure” and “multi-narrative integration”. Thu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ile meta-narrative provides readers with a textual space for the future and integrates authors’ personal intentions, the expression mode of meta-narrative allows the obstacles faced by postmodern expressions between reality and traditional standards such as fragments, collage, and anti-tradition to be dissolved in science fiction, an increasingly popular literary genre.

Keywords: science fiction, meta-narrative, criticism and communication, narrative exposure and multi-narrative integration

DOI: 10.13760/b.cnki.sam.202402018

元叙述是“关于叙述的叙述”，当元叙述暴露自身为虚构时，对于文本阐释界限的“犯框”会同时将作者与读者引向关涉区隔框架的意义生成问题，推动文本中真实与虚构的区隔讨论转换为文本与批评、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性反思。因而，当具有强虚构特质的科幻文学颠覆自然主义的叙事逻辑而采用元叙述书写策略时，其对主体意识与现实反思的关注会呈现与传统文类不同的阐释效能。美国非裔科幻作家塞缪尔·R·德拉尼（Samuel R. Delany）率先窥视到20世纪60年代科幻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在元叙述中的幽微互动，在1967年出版的科幻小说《爱因斯坦交集》（*The Einstein Intersection*）中，以“露迹式”与“多叙述合一式”的元叙述模式营造出科幻之“虚构”与文化历史之“真实”的交涉。以此小说为楔，本文试图论证：与典型的硬科幻相较，科幻元叙述模式通过参与文体规则的符码游戏，形成了鲜明的“批评性”与“交流性”特征；在多种文化语义实践中，科幻元叙述关注创作主体的自我意识与文本批评空间的开放性与交流性，由此，反叛现实与传统经验的后现代表达所面临的阻碍，也能在科幻这一逐渐流行的现代文学体裁中被消解。

一、科幻元叙述的“批评性”与“交流性”特征

作为新兴的文学类型，科幻构筑的不可能世界的虚构性稍显复杂，在20世纪科幻理论家的观点中^①，科幻的“虚构”不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都始终以在场的姿态存于文本的叙述逻辑中，并以迥异于传统叙事惯例的隐喻，更改人与经验环境、符号再现的叙事关系。

20世纪70年代，科幻理论家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从小说的形式、思想与本质三方面回应了加斯（William H. Gass）所提出的“元小说”或“元虚构”（metafiction）概念，并将其归入与科幻小说并列的实验性虚构范畴。斯科尔斯敏锐觉察到科幻小说与元小说对“虚构”有共同的关注与认知，因而把二者分视为“虚构文学传统的不同维度”（Briggs, 2012, p. 8）。这不仅是彼时文学对自我历史地位认知的转变，从叙述角度来看，更是试图在“虚构的现实与现实的虚构”二者之间找寻微妙平衡的实验性尝试（Scholes, 1979, p. 8）。

对于以虚构评论虚构，抑或以虚构建立虚构的科幻作品而言，迂回地隐射、描摹与讨论现实的过程所传递的认知疏离，实质上将科幻置入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中——对自我指涉与自我批评的元小说式强调。^②这说明，元小说中“关于小说的小说”的自我指涉性，与科幻通过揭露故事虚构过程体现出的元叙述表现模式颇为相似。事实上，元小说“在所有小说中的内在倾向与功能”（Waugh, 1984, p. 5），极大推动了其叙述模式与科幻融合的良性反应。麦卡弗里、勒古恩、拉斯等人更是颇为认可二者的“后现代主义表亲”

^① 达科·苏文（Darko Suvin, 1979, pp. 7–8）指出，科幻的“充要条件是陌生化与认知的出场和互动，并以拟换作者经验环境的想象框架为主要策略”。卡尔·弗里德曼（Carl Freedman, 2020, p. 21）则继承苏文的思想并认为由于再现的不透明，虚构作品必然涉及再现与“指称对象”之间的殊异，他异性与陌生化无可避免。

^② 拉里·麦卡弗里（Larry McCaffery, 1990, p. 6）指出，元小说迹象在迪什（Thomas M. Disch）的《特拉的小狗》（*Puppies of Terra*, 1979），拉斯（Joanna Russ）的《非凡（普通）人》[*Extra (Ordinary) People*, 1984]以及德拉尼的众多作品中有着鲜明的表征。在《特拉的小狗》中，迪什拟构了人类转变为小狗并被一群视作“主人”的生物所奴役的故事。文中的元小说意味表现于叙述者以作者的口吻向读者发出的真诚宣告，小说以动物寓言形式暴露并向读者即时传递关于作品虚构生成与自我指涉的张力。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天堂的车床》（*The Lathe of Heaven*, 1971）同样构建了如此清晰叙述自身乌托邦构筑过程的元小说图景，在充斥暴力、贫困与环境异变的未来世界，奥尔能够改变现实的做梦能力与无法履行的乌托邦幻想共同存在于自相矛盾的阐释过程里。

□ 符号与传媒（29）

关系。学者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2003，p. 28）将元叙述标记为所有涉及话语及其建构性的自我指涉性陈述。哈琴（Linda Hutcheon，1980，p. 1）则认为，对自身叙述与语言特性的评价也是元叙述文本中自我反涉意识与自恋性的强烈表现。因此，元叙述在科幻中展现的表达模式，能被视为元小说的叙述逻辑之一，即便无法将二者全然等同，依然能通过对自我指涉、元虚构方法的相似关切锚定其合理性。此外，在认知逻辑的主导下，倘若叙述者想以科幻中冷峻的科学理性构建虚构的新奇性，并期望受述者准确接收故事语境在符码层次上的变动和更改，那么，元叙述特性的有意或无意应用，更能区分叙述者对于该体裁的理解与使用程度。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82，p. 156）将科幻文学的元小说性视为文化文本对于自我指涉话语的改变，即随着文学现代主义的推动与乌托邦叙事的浮现转向更为具体的自我指涉，在自我对文本困境的质询中找出最为深刻的主题。布里格（Robert Briggs，2012，p. 9）进一步认为科幻小说中的元叙述维度从未减少，只是更需强调其存在的必然性。那么，采用元叙述的科幻往往会进入一种关涉小说批评的语义场，即在文本基于科学知识的逻辑建构中，主动揭露叙述编造或虚构的过程，形成对叙述生成的自我认知，凸显作者暴露文本虚构过程并融入文本批评意识的意图。

遗憾的是，在西方部分流行的科幻书写里，元叙述的痕迹并不明显。如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机器人系列”与“基地系列”中暴露机器人文文明和基地庞大架构生成过程的意图并不明显，而是竭力维持两种文明在各自叙述进程中的自然化状态，尽量避免引发读者对虚构的注意与猜疑。同样，卡德（Orson Scott Card）在《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三部曲以及弗洛·文奇（Vernor Vinge）在《深渊上的火》（*A Fire upon the Deep*）中各自维护外星虫族入侵与三界种族冲突故事逻辑的合理意义。此类科幻小说缺少向读者解释故事逻辑生成过程的自我指涉环节，以强烈的“真实感”使接收者跨越技术符号的可能想象而在情感意识的投入下漠视区隔。

这说明，元叙述的自我指涉性要求科幻书写必须具有浓厚的作者批评意识以及有意与读者沟通的企图。一方面，与诸如黄金时代以来关注物理科学细节的典型硬科幻相比，采用元叙述的科幻往往呈现出鲜明的“批评性”特征。这种“批评寓于叙述”的文本特性具体表现为作者意志在叙述中的有意流露，使小说的生成过程同时成为作者或叙述者的文本批评副本。赵毅衡（2013，p. 310）指出：“元叙述的主要意义，就是‘用叙述讨论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批评演出，是叙述者或人物替代批评家与理论家，从故事内部批评

叙述规则。”这既是元叙述与科幻本身虚构性与自我指涉性的共同使命，也契合了如斯科尔斯与詹明信等人对文学发展规律与社会文化条件转变的判定。

相比之下，当元叙述在科幻中占据主导地位，作者有意开展的持续、开放、自我反思式的对话，则会重新定义叙事行为与叙事认知。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旧金山三部曲”（San Francisco Trilogy）中通过对世界前景的虚构想象，呈现了预测未来以及“预测关于未来的预测”的模式，这既是将自我指涉与未来图景联系的元叙述实践，也是其对“科幻预言未来的书写”是否依然可行的深切思索与批评。同样，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1962）通过嵌套的故事结构，以《易经》的卜筮与名为《蝗虫成灾》的小说创作过程，评判了实然历史与或然时空的缠绕，达成了寓真实历史于虚构的叙事结构，并由此生成可供批评的科幻元叙述空间。科幻元叙述在传统科幻将当下社会现实投射至未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作者所处的真实经验世界与其所构筑的意识世界之间的阐释关系呈现于文本表层。

另一方面，若以区隔框架的差异区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编码活动，作者对元叙述文本阐释规则和界限的“冒犯”便会自然而然邀请接收者进入虚构与真实的批评语境。这在传统科幻书写中稍显模糊，因为即便作者意志并不显露于文本，此类作品的叙述惯例依然可能促使读者自主设定并接受书写中的“真实性”而进入理想的阅读状态。^①因而，当作者将超出故事范围的叙述如书写意图、叙述假设、文本走向等融入故事并以此呈现批评性特征时，读者进入开放性叙述空间的过程也会引发科幻元叙述作品中作用于意义建构的“交流性”特征。如果说“批评性”是作者在科幻文本中依旧在场的鲜明标志，是元叙述的注脚，那么“交流性”则更为强调读者与作者互动的主动性，乃至在由元叙述决定的文本开放性中，读者有权选择多样化信息进行解读。

元叙述是为了对虚构和现实的关系提出疑问，探寻小说外部世界虚构存在的条件（Waugh, 1984, p. 2）。因此，当读者接受元叙述体裁规定的“议定书”时，便潜在地与作者签下了关于“虚构”的契约（艾柯，2005, 123 – 125），作者寓于文本的批评性意向也在体裁的规约下与读者一同建构了新的符号表意方式，元叙述的交流性就此成立。

^① 例如在小说《三体》中，刘慈欣建构的三体文明或许并不真正存在于宇宙文明之中，但其建构的符号世界却“真实地”基于当下科学理论技术实在存在于文本叙述里。

于具有元叙述特征的科幻文本而言，契约关系的存在绝非禁锢，而是强调作者、读者乃至小说主人公的交流关系。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五号屠宰场》（*Slaughterhouse-Five*, 1969）开篇便为读者释放了文本的虚构信号，将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史实通过碎片化的元叙述模式，融入作者与主人公的共同经历，形成“虚实难辨”的阐释界限，同时也激发了读者拷问历史的冲动。被视为科幻元叙述著作的《索拉里斯星》（*Solaris*, 1961）则通过人类探索胶质海洋覆盖的星系的过程，使读者在科学、神话、寓言、文学等多样性话语中重新思考科学对于地外文明的有效性、自我与他者的哲理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科幻虚构性的体裁特征决定了其存有引导接收者解释文本中元叙述痕迹的可能。有别于典型科幻作品对于叙述自然化以及呈现文本叙述真实的坚守，在科幻元叙述作品中，当文本的元叙述特征占据相当比例，则可能通过体裁期待向读者赋予片段性与发散性的阐释效力，在多种叙述融合的情况下，读者进入文本批评空间也变得更为开放与自由。

美国非裔科幻作家德拉尼（Delany, 1994, p. 27）也曾提出颠覆性的科幻定义，将科幻视为复杂的“代码集合”与“阅读性策略”，这与哈琴将元叙述的关注点置于叙述结构和读者角色不谋而合，前者认为故事的可能性条件与现实世界不同，因而无论文本满足抑或颠覆文学期望，读者阅读文本的体验仍会受到这种期望的影响（McCaffery, 1990, p. 82）。

值得注意的是，科幻的表述模式也可能以背离常识、脱离认知语境的反科学寓言呈现，此时的叙述以非自然的形式切入，依然隐含着元叙述的特征，因为陌生化的语义场也同是元叙述对文本体裁规范发起的挑战，如若延伸至元叙述的作者意图，则是在文本中融入的科幻批评的力度。那么，对于科幻元叙述而言，究竟应将其视为“真实的虚构”还是“虚构的真实”？其特性如何在文本中揭露叙述再现痕迹与破坏文本叙述自然性的“犯框”共性，同时讨论经验环境拟换下可能世界的逻辑认知问题，思索作者意志与读者参与的互动意义？笔者将以元叙述科幻小说的先驱《爱因斯坦交集》为例，进一步阐发元叙述“批评性”与“交流性”的具体表征。

二、科幻元叙述在文本中的具体特性

始终致力在科幻写作中探寻科幻批评力度的德拉尼，在其界定的“科幻代码游戏”这一概念中，暗示再现体、对象与解释象三者的不同排列关涉的“科幻”与“科幻批评”的语符殊异（Delany, 1994, p. 187）。德拉尼认可

指称关系与叙述意图的差异存在于科幻奇幻或超现实主义等小说体裁里。但他同时觉察到，即便使用相同的寓言、修辞，不同文类对现实的模仿叙述也有较大的差异，读者进入文本的阐释方向更不尽相同。鉴于此，他理性、自觉地摆脱传统文类为作者与读者设定的解码规则，执着于将科幻的“代码游戏”融入对实际写作与阅读策略的双重考量之中。因而，德拉尼对于传统文类选材与语言结构的叛逆，便体现为其文学创作中多元素合一的拼贴式、互文叙述。

20世纪60年代，在传统硬科幻写作模式式微，而西方文学批评也开始由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之际，德拉尼大胆采用“寓批评于叙述”的自我指涉性书写模式，创作出带有浓郁后现代戏仿意蕴的科幻元叙述著作《爱因斯坦交集》。

小说以外星人洛贝（Lobey）的俄耳甫斯式寻妻之旅为故事框架，勾勒未来地球遭遇大屠杀后的“后世界末日”景象。在被人类遗弃的地球上，基因畸形的外星生物繁衍生息并不断尝试让自己的身体和思维适应地球的等级规范与神话文明。整部作品除奇异的科技想象与神话故事之外，作者意识以及与读者交流的元叙述表征也极为鲜明，前者具象化为附着于文内的露迹式叙述，而后者则强调多叙述合一的建构。

在小说中，德拉尼把自身游历欧洲的见闻以四段“作者日志”的形式摆在小说之中。在日志里，他依靠露迹式元叙述，向读者抛出关于“科学神话悖论性”的探讨。如斯科尔斯（Scholes, 1979, p. 114）所言，元叙述将所有批评的观点融入小说的创作过程，那么，于德拉尼而言，露迹式元叙述的运用则串联起其书写建构过程中身为作者徜徉于小说内部的流动状态，从思考如何化用经验环境所提供的各种技术符码，明确小说以俄耳甫斯神话为主题、探寻死亡的意义，到决心为文本赋予不确定的结局，德拉尼有意漠视虚构叙述中“可能世界”的逻辑在“实在世界”中要面临的阻力，以露迹的元叙述方式率先声明故事的“虚构”，之后又暴露了自身对纯粹科学技术走向人类未来的消极态度。

事实上，超出叙事边界，是后现代叙事实验的突出标志，在引导读者解读小说虚构过程的同时，作者对叙述的掌控、身为叙述者的意志也无处隐藏。当德拉尼以“作者日志”将叙事变为一种解释与评论元叙事的活动时，他不仅实现了作品对不同幻想叙事门类边界的跨越，即俄耳甫斯神话叙事、后世界末日科幻叙事、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历史叙事，也让“作者日志”本身成了故事不可剥离的有机组成部分，元叙述自然成为其以神话解码科幻宇宙

□ 符号与传媒（29）

的批评式注脚。

德拉尼认可作者与文本之间开放、持续的结构关系（McCaffery, 1990, p. 93），这与传统意义上将小说视为封闭、完成的状态不同，其观点更接近元叙述文本中自我反射的特性所呈现的批评意识。在比《爱因斯坦交集》更为广阔的科幻创作实验中，德拉尼也始终以元叙述的方式借用神话符号，构建作为“边缘文学”的科幻与西方传统经典的内在关联。但要做到这点，单凭批评式露迹与故事逻辑的强意志解读远远不够，因此，德拉尼着力在拼贴、互文的叙述中打造出文本信息更为多元的交流空间，生成作者意志与读者参与共同作用的意义世界，呈现多义的主题探索与科幻元叙述的独特叙事机制。

多样化的读者群体如何共同参与科幻书写的元叙事世界？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 1965, p. 156）认为：“读者的任务并非接受一个已完成的、充盈的、自我封闭的世界，相反，他需要提供一种积极的、有意识的、创造性的协助，自行参与作品创造并由此构筑自己的生活。”这是科幻元叙述对其交流性特征的要求，即无论作者意志如何控制故事生成过程，也要尽量创造能让读者进入文本世界的开放性释读空间。因为即使作者清楚如何讲述故事，其叙事依然可能在自我意识、自觉与反讽式的自我疏离中回到叙事行为本身（Currie, 1998, p. 62）。采用了元叙述的科幻往往在双层区隔的不透明性中打破接收者的预先期待，更新读者在阅读初始对于故事逻辑预设的合理性与真实性，因而，作为为自身提供解释线索的书写策略，元叙述在德拉尼等众多科幻作家笔下能够自然表现出作者与读者所建立的显露于文本的社会契约关系。

在小说中，德拉尼则通过多叙述合一式的元叙述模式，向读者呈现多种故事线索与文本信息，引导读者参与故事意义的建构活动。在元叙述中，多叙述合一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叙述模式，它意味着文本中涵盖与一个或多个文本的互文性，通过引用、置换、裁切、转喻等方式形成文本乃至文化之间的共同体关系。与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对于俄耳甫斯神话“故事中讲故事”的元叙述模式相似，小说中洛贝开启的追寻之旅源于复活心爱之人弗里扎（Friza）的期望，但这一叙事逻辑还同时交涉出智者迪赫（Dire）讲述的关于披头士乐队成员林戈“摇滚乐”为欧律狄克的现代版俄耳甫斯的“故事中的故事”（Delany, 1998, p. 10）。

此外，德拉尼在太空歌剧式的故事架构中也涵盖了骑士追寻母题、耶稣受难等宗教主题，以及比利小子等真实人物。虚实难辨的嵌套故事写作在文本之外既满足了以俄耳甫斯为核心作为艺术创作象征人物的作者意识反馈，

使文本成为具有交融意义的互文编织物，也表现出德拉尼所建构的符号空间绝非单一、封闭的语言集合。这意味着读者有权从任何一种原型母题出发进行解读，并且都能抵达德拉尼以此叙述方式回应的 20 世纪 60 年代新浪潮运动对科幻创作内容与形式的关注。

因为元叙述的痕迹既揭示了“叙述与社会、存在、主体的关系”，也存有“利用叙述的逼真性以制造意识形态神话的可能”（赵毅衡，2013，p. 310）。元叙述的开放性提供了解读文本意义的自由权利，读者依靠多叙述中的各类原型分流进入该小说内部，再通过剧情的合一达成“交流”，至此，德拉尼露迹式的“批评性”才能够成立。总而言之，通过以多叙述合一式元叙述的模式，德拉尼探讨了碎片化的跨层级、跨语境的文化交往空间。

当文本被固化为一种符号叠加与组合的编织物时，毫无疑问，元叙述的书写模式彻底改变了科幻作品中的符码运作规则，使科幻文本的符号生成成为更具主体意识与历史反思的艺术生产性活动。德拉尼的科幻实验化用可能世界的虚构去探寻实在世界，这种“坐虚探实”的科幻创作模式已初见雏形。以此，德拉尼科幻元叙述所蕴含的“批评性”与“交流性”在其暴露自身与拼贴互文的叙述策略中得以彰显，作家与批评家身份的互动似乎超越了传统的阐释界限，进入更为广阔的后现代批评语境。

三、科幻元叙述的后现代建构

20 世纪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理论在西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也启发了包括元叙述理论在内的多种文论的进一步发展。其对于狂欢化诗学的阐发在某种程度上也佐证了元叙述的底层逻辑，即一切封闭的符号壁垒都可能面临来自外部力量的强力摧毁，元叙述所达到的目的也正是跨越阻隔，提供符号文本多义阐释的批评性可能。因而，为打破共识与约定俗成的努力实际上是元叙述的后现代意指，从文本叙述体系内部引发异质性观念变革的可能由此生成。

20 世纪 60 年代，在元小说迎来爆炸式增长之际，科幻作家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在文学创作与各类社会文化运动之中相互交织，也在“真实”与“虚拟”的交错之中相互呼应，在构成对抗性文化的同时，又糅杂各类思潮中不同要素的源与流，展现出其“深刻的文类自我意识与自我批判”（黎婵，石坚，2013，p. 71）。因此，自彼时而勃发的科幻与元叙述的融合生成于对现实的矛盾与突兀的观照之中。

□ 符号与传媒（29）

与此同时，沉浸于解构主义的后现代理论家们清晰地认知到，在解构理论自身的悖论与矛盾中，与元叙事与虚构共谋是一切知识都无法逃脱的命运（哈琴，2009，p. 17）。科幻中的元叙述首先打破了文本意义生成的完整性，使得任何真理、真值的输出都可能面临作者、读者或文本互文拼贴碎片的质疑，形成众声喧哗的狂欢宇宙。

德拉尼身为美国非裔科幻的先驱，身处区隔，跨越区隔，在真实与虚构模糊不清的边界里营造作者意识表达的广阔区域，主动形塑读者阐释空间，对于科幻元叙述理论的发展和验证具有重大意义。他通过打破古希腊神话人物与科幻外星人的叙述隔膜，将个体的批评视野与读者的释读空间从传统科幻文本的科学性、虚构性讨论，拓展至历史、文化层面的整体性考量。因此，当触及科幻文本元叙述的特质时，作者不再执着于呈现文本故事的绝对真实，其建立于自我指涉意义上的文化借鉴意义相较而言具有更为显著的批评效力。

进言之，鉴于德拉尼本身的种族与文化身份，其科幻创作欲求绝非单纯源于对科幻语言符码游戏的热衷，元叙述的表达自由使其更能摸索出作为跨种族知识分子，在彼时固化的社会体系中，将虚构文本建构为表达少数族群中个人意志的有效性。基于元小说自我指涉的本质，元叙述着意在非自然叙事空间中建构既能逻辑自洽，又能通达叙事之外的现实、经验世界并与之进行对话的文本，使具象的科幻要素与抽象的科幻批评形成交往互动的机制，从而跳脱单一、固定的区隔框架，其中，也可窥见元叙述多元且开放的后现代意义。

德拉尼的科幻书写有力验证了这一点——在元叙述为读者提供未来世的文本空间并渗透作者个人意志的同时，现实中割裂的碎片、拼贴、反传统等后现代表达所面临的阻碍，也通过元叙述的表达模式，在科幻这一逐渐流行的现代文学体裁中消解。科幻的“虚构”接纳了后现代的特性而变得“真实”，现实的“真实”则在科幻叙事中成为读者不确信的“虚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元叙述进入科幻作为虚构体裁的语义场，二者相辅相成的互动性促使符号系统接受后现代多元文化的检验，在既分散又整合，既解构又执着于意义建构的矛盾体之中，生发科幻元叙述的诗学可能。

这是因为，当元叙述并非单纯作为叙述类别而是文类批评的手段被讨论时，读者需要跨越表层意义，审视内置于元叙述文本之中看似整合却无比开放的意义。采用元叙述进行创作的作家们也往往会在文本中设立引导读者阐释文本外世界的信号，创作的封闭性就可能转变为意义持续生成的“熵增”过程。这一抽象的逻辑论证源自将元叙述用于科幻体裁之时所引生的与文类、

读者乃至作者自身的对话原则。

继 20 世纪 60 年代元小说创作的爆炸期之后，科幻作品或多或少呼应了此类元叙述书写策略。^① 必须要指出的是，具有科幻元叙述特征的科幻小说虽能实现以虚探实、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但始终经历着双层虚构叙事的中转，而非如自然主义小说或传统科幻小说那样直截了当地反映现实。因此，对于叙述的实在“真实”例如对当代科技的表现，元叙述科幻作品比传统的科幻书写确实显得迂回、曲折。然而，当知觉大过物理、科学幻想难以全然被理性解释时，若想要未来多元的虚构世界在引入读者的探索趣味之时依旧合理，“虚构情节的文学价值”可能就更需要依靠元叙述作为后现代书写策略的助力，因为元叙述对于故事虚构的强化契合了新的科幻书写在“体裁之中建构体裁”的需要（梅亚苏，2017，p. 4）。

正如德拉尼以未来世界的外星生物探索人类神话文明来实现其“人性化”的反讽叙述一般，叙说未来之虚构故事的“真实”与“可能性”不再重要，德拉尼真正关注且希望引发读者注意的，是神话以拼贴互文的方式强势替代科学预言未来世界行为的意义。将中世纪哥白尼的宇宙革命论放置于未来语境以引发人类（读者）对于自身的反思，于德拉尼的科幻叙事中同样成立。这既是作者对于黄金时代众多科幻小说一味崇尚科学理性的质疑，也能够在神话非理性意识的基础上，重塑爱因斯坦科学理论的人文价值。

对于期望从特权式的书写中挣脱出来的“弱质身份”作家而言，元叙述为建构自身文本意义的独立性，提供了反讽与解构的先锋性书写模式，也展开了在“他者”的文学地基之上建构“边缘文学”的未来图景。德拉尼无疑属于其中的一员。正如哈琴（2009，p. 174）指出的，后现代主义通过互文或戏仿的方式，“以使用正典表明自己依赖正典，但又通过反讽式的误用来自揭示对其的反抗”。因此，只有在具有科幻元叙述特征的作品中，才能有既“解构经典”又饱含“叙述评论叙述”的双重可能。

如在区隔框架内的文本具有意义生成的可能性一样，德拉尼科幻元叙述书写实验有力验证了文化符号学家洛特曼（Juri Lotman）提出的“符号域”的启发意义及适用性。这一概念提供了文化研究与文化生产机制的方法论

^① 除上文提及的科幻作品以外，约翰·克劳利（John Crowley）的《引擎之夏》（*Engine Summer*, 1979）与勒古恩的《时时归家》（*Always Coming Home*, 1985）有异曲同工之妙，罗伯茨（Adam Roberts）曾借用沃伦·罗切尔（Warren Rochelle）的观点点评后者，称其虽未热衷于追求元文本的表意形式，却也深刻展现了勒古恩着意于从社会文化层面探寻有价值、有尊严的人类社群意识的书写意图（罗伯茨，2010，p. 261）。

□ 符号与传媒（29）

（特洛普，2013，p. 159），唯有在符号域的空间内，意义阐释才可能存在，这对于元叙述在区隔框架内探讨意义生成，具有转向关注整体性的借鉴意义。倘若将科幻元叙述的文本理解为符号域，其封闭独立的边界仍然存有与外部元素对话的可能。在这一层面，科幻元叙述着重展现自身的语义修复、整合、重构能力。德拉尼（Delany, 1994, p. 190）曾提出与之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科幻给予读者的“体裁感”，来源于科幻元素的向外传播与传统元素（通俗文学）向内渗透的互动交往。正如他在小说《爱因斯坦交集》中与神话、诗歌、小说的对话实践一般，经历后现代语义环境的渲染，科幻元叙述更能传达出文本与文化结合的双层结构，即小说为主人公创作的“真实世界”与元叙述形塑的反思式“审美世界”。

总而言之，无论是借助巴赫金的“狂欢诗学”，还是文化符号学中“符号域”概念，包括德拉尼自身对科幻元叙述特质的理解，科幻元叙述在“叙述自身叙述”的高维视角中始终保持着看似矛盾，却清晰指向后现代特征的解构与重构的二元辩证统一。即使面对约翰·巴斯（John Barth）提出的“枯竭的文学”抑或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言明的“作者已死”的警告，如德拉尼般的后现代文学创作者仍能孜孜不倦地开展一场文学之于形式与精神的自救运动。元叙述在科幻中的回响映射出鲜明的后现代意指，其科幻的技术性描绘与文本映射现实的力度在每一个具有元叙述特质的科幻书写中被重新估算：破除纯粹的“科技迷信”，以元叙述指向科幻中“寓批评于科幻”的可能，更有利于打破科幻批评与科幻创作的现实等级框架，彰显未来元科幻更为多元的人文启迪微光。

引用文献：

- 艾柯，安贝托（2005）。悠游小说林（俞冰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哈琴，琳达（2009）。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黎婵，石坚（2013）。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流派的乌托邦视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65–72。
- 罗伯茨，亚当（2010）。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梅亚苏，甘丹（2017）。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构（马莎，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 特洛普，皮特（2013）。符号域：作为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对象（赵星植，译）。符号与传媒，6，157–166。
- 赵毅衡（2013）。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Briggs, R. (2012). The Future of Prediction: Speculating on William Gibson's Meta-science-fiction. *Textual Practice*, 4, 1–23.
- Currie, M. (1998). *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Delany, S. R. (1994). *Silent Interviews on Language, Race, Sex, Science Fiction, and Some Comics: A Collection of Written Interviews*.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Delany, S. R. (1998). *The Einstein Intersectio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Fludernik, M. (2003). Meta-narrative and Metafictional Commentary: From Metadiscursivity to Metanarration and Metafiction. *Poetica*, 1, 1–39.
- Freedman, C. (2000). *Critical Theory and Science Fictio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Hutcheon, L. (1980). *Narcissistic Narrative: The Metafictional Paradox*.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 Jameson, F. (1982). Progress Versus Utopia; or, Can We Imagine the Future?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 147–158.
- McCaffery, L. (1990). *Across the Wounded Galaxies: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Robbe-Grillet, A. (1965). *For a New Novel*. New York: Grove.
- Scholes, R. (1979). *Fabulation and Metafiction*. Urbana,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uvin, D. (1979).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Literary Genr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augh, P. (1984).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作者简介：

聂韬，文学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非裔科幻文学。

敬琼尧，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国非裔科幻文学。

Author:

Nie Tao,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is research field is African-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Email: nietao2023@163.com

Jing Qiongyao, master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r research field is African-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Email: halsey202311@163.com